



心史文丛



「美」蒲地典子 著 闫小波 译

黄遵宪与日本模式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Reform in China 中国的变法



凤凰出版社



心史文丛

孙江 主编

融化新知

昌明国粹

阐求真理

论究学术

「美」蒲地典子 著

闫小波 译

Reforming 中国的 变法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黄遵宪与日本模式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 / (美) 蒲地典子
著；阎小波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7
(学衡心史文丛 / 孙江主编)
书名原文：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ISBN 978-7-5506-3591-3

I. ①中… II. ①蒲… ②阎… III. ①黄遵宪 (1848-1905)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49115号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by Noriko Kamach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81. Copyright © 198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书 名	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
著 者	[美]蒲地典子
译 者	阎小波
责任编辑	孙思贤
装帧设计	徐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照 排	南京凯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秣周中路99号,邮编:211153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9千字
版 次	202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3591-3
定 价	7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928003)



黃遵憲像

楊翁秉雅而不亂和從景野而不
 異正及極窮對數不為不親而量
 伏來應溪觀者以堵嘆今日人情
 之墜為打此一幸可知也
 地理自然無足保怪若使人人
 皆知杜米宋之無謂雖郭英
 黃遵憲公仍加補在無不為言其
 宜公度為 黃遵憲公
 其人華萃多村潤博宏深以
 吳主張公瑾唐之非也 晤
 櫻老今日亦未非是花不損是石
 願祝老人年一歲者以此花也
 不料今日未過解體高有新寄
 如風楊花輕送他人書入拓譯
 上天台之想文係字福為卷一冊
 凡書無多幸
 楊翁今日亦會稱真個楊花好一封
 佳緣
 此長櫻花有數日排致同
 一室約里許難以盡計
 此花有無謂之事權者何以息之
 或深而麻星
 重辨
 二王氏先生之闊年其不佳故年
 且亦有佳作積兄示

黃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人的笔谈稿之一

宜用手声字亦可
 請
 夫人園一字如日步讀
 春風花事醉櫻桃人
 影衣香快此意歸
 去秋心携花作佳
 折枝不怕樹頭
 高
 見陽不惜碎滿地
 花第二意
 留陽春一曲調水香
 長隨十里看櫻桃
 吳說少年行樂事登樓若子樂高
 櫻向時節賦夫桃
 一曲春風快意適
 沈碎旗亭笑欲晚
 樓窗
 持月輪馬

黃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人的笔谈稿之二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國統志一

白河天皇立諱貞明後三條長子 敎通關白尋薨代以賴通子師實帝政自己出相門斂手而愛憎任意好色信佛竭民力以事浮屠佛像在位十五年改元曰承保曰承禪位後猶專政四十餘年國勢大敗不可收拾堀河天皇嗣諱善仁白河第二女實師實攝政尋薨其弟師通代之旋以師通子忠實為關白帝屢於夜分覆視章奏而制於白河上皇不能有為上皇制院別當設兵曹置北院士奉宣旨施行曰院宣因所愛皇女准中宮死哀痛遂削髮稱法皇令皇子雍髮為法親王時出羽酋復亂源賴義子義家用兵三年討平之請賞將士功朝議以為私

日本國志卷二

關不許在位二十一年改元曰寬治曰嘉保曰承長為羽天皇嗣諱宗仁堀河長子五歲 忠實攝政尋罷以其子忠通為關白法皇聽政如故僧徒作亂勅源平二家拒卻之在位十七年改元曰天仁曰天永法皇令禪位於長子顯仁年五歲是為崇德天皇及鳥羽立為中宮情不改鳥羽皇御之 崇德嗣位忠通攝政法皇仍聽政尋崩而鳥羽上皇聽政亦二十餘年久之亦削髮稱法皇崇德在位十五年改元曰長永曰長治曰永治為法皇所追禪位皇太弟鳥羽法皇多內寵後長仁實女皇欲其速即位帝禪讓即日從者謂皇太弟帝欲使明且審謙遣中使往徵數次終不聽及藤原朝皇弟是鳥羽弟尊為上皇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近衛天皇諱體仁院中在位十五年改元曰久安曰仁平曰天養受制於法皇鬱疾崩

清光緒年間富文齋版《日本國志》書影

廣東黃遵憲公度著

謁氏膏血造浮屠佞佛甘稱三寶奴匹馬出宮倫視髮上皇尊號半僧徒

自欽明時佛法東來蘇我馬子首信之推古以還日崇尚至聖武自稱三寶奴後祝髮為沙彌勝滿是為天皇披薙之始至花山天皇信石大臣兼家之言夜潛出宮至花山元慶寺削髮其後禪位皇子者多半為僧徒盛時自上公侯下至庶民不建寺塔不列人數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谷神工又令七道諸國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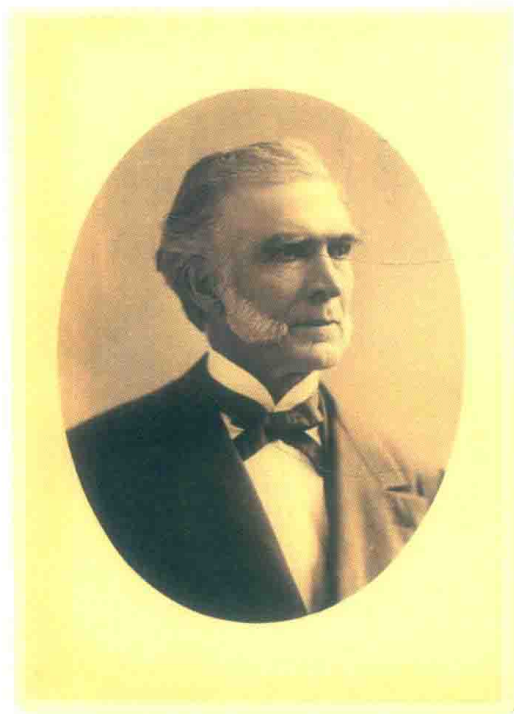
日本雜事詩卷二

各用其國正稅於是舉國之費十分而五一寺度僧歲三四百人舉國之民禿首過其半多家蓄妻子口啖腥膻甚至羣聚為盜竊鑄錢貨黨徒相攻敢劫關白之第入太政大臣家掠財物奪莊園且率徒黨發山陵入宮殿劫神輿後宇多帝時至毀閣截簾破行事障子帝乃御昇輿逃匿內大臣私第暴亂淫縱天下所未有也

山僧未出家

長跪蒲團誦法華緇衣半袒覆袈裟周妻何肉都無忌喚作維新後僧徒田產多沒入官其勢遂衰明治六年下令僧徒許食酒肉娶妻妾僧服如中土惟嚴寒亦蒙紗衣謂之

清光緒年間黃氏駕江權舍重刊本《日本雜事詩》書影



黄遵宪的美国友人傅烈秘
(Frederick A. Bee)

来源：Lewis & 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位于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

来源：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UC Berkeley, Bancroft Library

致 谢

首先,我要由衷地向费正清和史华慈教授表示谢意,是他们指导我在这一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得益于他们的持续帮助,我才撰写出博士论文并成书。我还要向直接或间接帮助过我的市古宙三教授及许多朋友致谢,他们是柯文、艾伯特·克雷格、伊爱莲、傅礼初、马里厄斯·詹森、梁肇庭、查尔顿·刘易斯、中村政则、唐·普赖斯、石约翰、比阿特里斯·斯佩德、菲利普·韦斯特、杨承恩等。他们阅读了全部或部分书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我特别要向黄延毓博士表示敬意,他向我提供了有关黄氏家族及其祖父黄遵宪的重要资料。玛丽安·威尔逊多年来帮我编辑手稿,弗洛伦斯·特雷费森不仅帮我编辑最后的文稿,而且还协助我加工翻译诗文。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特鲁科·克雷格提供了附录和注释,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提供了索引。诚然,书中所有错误和阐释均由我负责。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和教育慈善组织给予了慷慨支持。密歇根大学支持我出版这部书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序 言

如何解释中日两国对近代西方作出的不同回应,对治东亚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个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结束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遂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全方位的工业化被延宕至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有关这两个国家并列发展的问题,詹森在他的著作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日关系作了深入阐述^①。为了探讨中国的反应如此痛苦而迟滞的原因,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伴随中国传统社会转变的“知识—伦理”问题上。现在我的研究正与这一主题有关。

列文森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处在由‘天下’向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之中。”^②日本则不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人的那种“大一统”观念直至19世纪中叶受到近代西方冲击后才开始动摇^③。随后,思想领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意识直到19世纪末才确

① 马里厄斯·詹森:《日本和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5年》,芝加哥,1975年。

②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卷1,伯克利,1968年,第103页。

③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剑桥(麻省),1974年,第5页。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对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剑桥(麻省),1968年。

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调和现代观念与传统价值。

在19世纪60—70年代，面对西方入侵和国内大规模的叛乱，为了恢复儒家秩序和王朝礼制，少数官僚和士大夫意识到中国需要“师夷长技”。由于他们试图捍卫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被视为“文化主义”，而非后来发展的民族主义。这种目的与手段（西方的技术）的内在矛盾，玛丽·C. 莱特在她的书中已作了充分的阐述^①。刘广京的著作对“师夷论者”及早期以倡导改革而著称的儒家士大夫，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冯桂芬（1809—1874）和郑观应（1842—1922）等作了充分的阐述^②。

在19世纪80—90年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它是建立在新的国家主权观念基础之上。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已牢固地树立起国家主权观念。当时，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官员已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能有策略地处理列强的要求，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石约翰在以德国要求租让山东为个案的研究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③。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猛然醒悟过来，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

① 玛丽·C. 莱特：《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同治中兴，1862—1874年》，斯坦福福，1957年。

② 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旧秩序的瓦解和西方的冲击》，收于何炳棣与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第1卷，第1册，芝加哥，1968年；《郑观应的〈易言〉：光绪初年的变法思想》，《清华学报》第8卷，第1—2期，第373—425页，台北，1970年；《作为爱国者和实用主义者的儒士：李鸿章的发迹期，1823—1866》，载《哈佛东亚研究》第30期，1970年，第5—47页；《同治中兴》，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1978年，第409—490页。

③ 石约翰：《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山东的德国人》，剑桥（麻省），1971年。

中国是极其脆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念通过严复(1854—1921)的著作而家喻户晓。史华慈已对严复翻译斯宾塞、赫胥黎、斯密、孟德斯鸠、穆勒等人著作的思想意义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严复所专注的是如何使国家富强^①,这被视为改革的目标。张灏认为,1895年前后至20世纪初的10年是思想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期间至关重要的发展,不仅是人们放弃了“大一统”的观念,最终去接受国家观念,将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的政治目标,而且出现了现代的“国民观念”^②。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成为朝野知识精英政治理念的基调。“官僚民族主义”是实权派总督张之洞(1837—1909)决策的依据;“商业民族主义”激发“条约口岸”商人郑观应呼吁内在的制度变革^③。事实上,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正是知识精英表达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在19世纪末那些倡导改革的人群中,民族主义这一主流之下的支流是一种普遍的乌托邦主义。在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涛中,乌托邦主义是一条涓涓不绝的暗流。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是晚清阐述乌托邦主义的最具影响的著作。萧公权在他对康有为的研究中指出: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观念和他对乌托邦的构想是在两个不同

①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剑桥(麻省),1964年。

②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剑桥(麻省),1971年,第297—298页。

③ 丹尼尔·贝克斯:《中国进入20世纪:张之洞与革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年》,密歇根,1978年;郝延平:《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改革者的买办》,载《哈佛东亚研究》第29期,1969年11月。

层面上发展的,后者与现实中国几乎没有任何联系^①。即便如此,康有为的乌托邦主义对他的改革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彭泽周在比较研究了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日本明治初年的社会政治思想之后也揭示了这一点。他所做的关于康有为和福泽谕吉(1834—1901)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看法的比较研究让人深受启发。二人均崇拜斯密及其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福泽谕吉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并积极鼓励富人追逐利润。康有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优越的社会,他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②。在20世纪初的前10年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这种理想主义转变为政治行动。普赖斯对这种乌托邦精神和民族主义如何激励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作了分析。他们将这场革命视为通向“平等与自由的普遍道德秩序”进程中的“一幕不可阻挡的普世道德剧的一部分”^③。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变法思想,不仅受到其知识取向的影响,且受到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的影响。如王韬,如果没有流亡沪、港的“条约口岸”而成为游离于正统秩序之外的知识分子,其变法思想将会有些不同。在对王韬的研究中,柯文将晚清的文化土壤分为沿海和内地,内地是传统秩序的中心,而沿海则处在直接面临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边缘^④。

清朝个人的功名是决定其社会政治地位的最根本因素。然而,在

①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西雅图,1975年,第409—437页。

② 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京都,1976年。

③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剑桥(麻省),1974年,第213、219页。

④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9章。

19世纪末博得较高功名的人未必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官僚机构早已饱和。不仅如此,此间由于人口增长及识字率的上升,围绕高功名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①。那些获得功名的士大夫要么不能入仕,要么被安排在微不足道的岗位上。当这种失落感与其民族主义的激情融为一体时,便助长了变法维新运动的火焰。

我对黄遵宪(1848—1905)的研究将以前人对同类问题的研究为基础。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问题: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现代化的。黄遵宪是第一位努力体认日本在受到西方冲击后发生巨变的中国人。他不仅对日本步武西方追求现代化感兴趣,而且关注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以1877—1882年对日本的亲身考察为基础,撰著了一部充满魅力的《日本国志》。他在19世纪80年代呼吁国人应以严肃的眼光看待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并希望该书能对中国的变法起到借鉴作用。他关于明治时期的日本,特别是明治维新的论述,对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黄遵宪在这场运动中也扮演了一个领袖的角色。

在柯文的“社会—文化”图谱上,黄遵宪位于沿海与内地的中间地带,他被认为是“内地改革的先驱者”。作为举人,黄遵宪是一位合格的正统文化的精英,但他很快就踏上了中国驻外使馆官员的仕途,置身于王朝官僚体系的边缘。在通往中央官僚的仕途中,他不得不沿着一条近似于沿海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前行。换言之,他的仕途就是:受到那些需要外交人才的重臣举荐,最终作为高级候补官员受到皇帝的召

^① 刘广京在《19世纪的中国:旧秩序的瓦解和西方的冲击》一文中讨论了无官职的士大夫。

见。就在他走向权力核心之际，其为官生涯被慈禧发动的政变打断。

黄遵宪的生涯代表了晚清帝国官僚流动的一种新模式。他是如何在仕途上谋求升迁的同时促进中国的变法？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一个子专题。

我用传记体的方法来展开此项研究，试图将黄遵宪刻画为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独特的客家伦理背景，他的那些启迪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以及他在国内外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

目 录

致 谢.....1

序 言.....1

第一章 黄遵宪的故里.....1

第二章 日本的发现:中华世界的东方前沿.....28

一、东京的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29

二、黄遵宪的日本友人.....33

三、《日本杂事诗》.....45

四、作为中国“文化省”的日本.....53

第三章 明治初年日本的西化.....65

一、对明治初年近代化的评价.....65

二、对现代日本的文化认同.....86

第四章 日本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侵略.....100

一、琉球事件.....101

二、朝鲜使臣金弘集.....109

三、亚洲能辅车相依吗?.....118

第五章	在加利福尼亚(1882—1885):面对种族冲突.....	125
第六章	为变法建言:编纂《日本国志》.....	144
第七章	地球的另一半:在伦敦和新加坡期间的思索.....	169
第八章	中日战争及战后的变法维新运动.....	188
	一、在南京充任张之洞的幕僚.....	188
	二、湖南的变法.....	207
第九章	人境庐主人:对新中国的期望.....	232
第十章	结语.....	250
附录一	黄遵宪家族世系表.....	257
附录二	中国驻日使团成员名单(1877—1882).....	258
参考文献	261

第一章 黄遵宪故里

绿树如云拥，门前百尺桐。吾家正溪北……^①

在唐宋时期，广东东部还是一个荒凉的贬官之地，剧毒的昆虫四处出没。但到了明朝初年，来自北方及中原一带的移民使该地变得人口稠密。在这些移民中，有一群人被称为“客家人”。他们与多数中国人一样也是汉族，但保留了自己的方言和习俗。

人们通常认为客家人因北方接二连三的内乱而不断南迁。自公元4世纪内亚部族入侵中原至9世纪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尤其在12—13世纪女真人和蒙古人统治华北期间，北方的汉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兵燹。在南方这块土地上世代居住的以“本地人”相称，南迁的北方人被他们称为“客家人”。但尚不清楚客家人何时接受这种称呼，且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传人，并借此发展他们独特的伦理。这种情感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明显。

客家人在华南分布较广，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及四川等省均有聚居，但多集中于广东的东北部，特别是清代嘉应州。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客家人，该地由此成为他们精神和文化中心，故其方言

^① 黄遵宪：《武清道中作》，载钱仲联编：《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1957年，第46页。